
三次曲阜重要军事会议

徐 金 城

历史文化名城、孔子的故乡曲阜，在国内外素有声誉，又西接兵家必争的战略重镇兖州，因此，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选在曲阜召开了两次重要军事会议，抗美援朝开始，朱总司令亲临曲阜，在孔林召开了军事会议。这些革命历史画面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新的光辉。

（一）济南战役前华野曲阜会议

一九四八年八月下旬，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济南战役前夕，在曲阜召开了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夺取济南战役的全胜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召开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由华东野战军前委主持，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有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华野十纵政委刘浩天等同志），会址设在曲阜师范学校西南角的一座二层楼上。

会议第二天，毛主席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发来电报。

当即进行传达、学习，周密研究了当前敌我情况，分析了双方作战条件，反复讨论了战役指导思想、组织指挥及各项保障工作。根据攻济打援作战方针，会议明确指出：在攻城与打援的关系上，攻城是目的，打援是手段。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应本着目的与手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原则进行布置。即以一部兵力攻济南的同时，集中大部兵力于打援。为此，会议决定：以七个纵队组成攻城兵团；另以八个纵队组成打援兵团。攻城兵团又分为东、西两个集团：西线兵团担任主攻；东线兵团负责助攻。华野前委的首长和各纵队的首长分线指挥。

为了有力地支援济南战役，地方各级党委都建立了支前机构，动员了民工，准备好了粮食、车辆、担架。各地人民武装、民兵组织都以临战姿态，布下了全歼济南国民党军队的天罗地网。

总之，这次曲阜会议对济南战役的战略方针、战术原则、后勤部署等各方面都作了精细的研究安排，对夺取济南战役的全胜有坚实的奠基作用。

（二）淮海战役前华野曲阜会议

淮海战役前夕，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简称华野前委）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在曲阜召开了扩大会议（亦称曲阜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夺取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

九月西柏坡村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为了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关于积极做好淮海战役准备工作的指示，济南战役刚结束，华东野战军即挥师南下，集结在临沂、邹县、滕县、济宁、兖州、曲阜一线。华野一部于十月三日到达曲阜，随即华野前委也到达，积极进行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华野指挥部就设在“衍圣公府”（即孔府）。

十月五日，在孔庙奎文阁，由粟裕同志主持，华野前委召开了以加强纪律为中心内容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野前委负责同志和全体委员，山东兵团、苏北兵团的负责同志，华野所属各纵队纵、师两级负责同志以及华野直属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还有华东局负责同志，共一百多人。

这次前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贯彻落实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开展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学习运动。与会同志认真学习、充分讨论了中央九月会议精神，一致通过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

二

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的指示，在扩大会议的过程中，专门安排了多次作战会议，讨论和研究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问题。为了需要，会议转移到孔林举行。

十月九日晚上，在孔林二道门楼上召开了各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由华野领导同志传达了前委研究的作战方案，到会同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反复研究，最后制定了淮海战役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十月十一日，华野司令部收到了中央军委发来的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示。

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又给粟裕、谭震林二同志发来电报。当晚，在孔林洙水桥北岸的云斋房，由粟裕同志主持，再次召开了作战

会议。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统一了作战思想，重新修定了作战方案，并对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和兵力使用作了全面安排和具体部署。

十月二十三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于曲阜下达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为加强淮海战役的领导，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领导整个战役。

为了贯彻华野前委会议精神，十一月三日，在孔庙奎文阁前的大院内，召开了华野前委直属单位营以上干部大会，由粟裕同志作了战前动员报告。

十一月五日，粟裕、谭震林同志离开曲阜。

三

华东野战军曲阜会议开了二十多天，通过对中央九月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学习和讨论，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革命形势，明确了党的方针和任务，统一了作战思想，增强了战斗意志，调整了内部关系，使华野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团结，在组织上更加统一，在政策水平上更加提高，在战斗力和纪律上空前加强。

为了做好淮海战役的战术准备工作，于战役发起前，华野司令部结合实战需要，在曲阜师范学校的一所大教室里召开了全军攻坚战术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对攻坚战术地位的认识，促进了军事训练，加强了攻坚战术的演习。为了配合部队的形势教育，华野政治部文工团利用休会期间赶排了话剧《前线》，在这个学校的大礼堂向部队指战员进行了慰问演出。还演出了京剧《逼上梁山》、《闯王进

京》等节目。

华野曲阜会议的成效是巨大的，《淮海战役组歌》中就有“曲阜会议伟大的成绩”的赞句。它的重要历史作用就在于为发起淮海战役做好了战前总动员，使华野全军上下，从精神到物质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打好淮海战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而它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意义，将永载史册。

（三）九兵团曲阜会议

一九五〇年十月，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一周年，举国欢庆胜利节日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不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疯狂地扩大侵朝战争，悍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境内，不断派出飞机侵犯我辽东、山东等地领海领空，轰炸和扫射我和平居民、渔船，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战争挑衅，中国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工厂，从学校到部队，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强烈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这种紧急形势下，朱总司令专程由北京来到曲阜，十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幽静的孔林享殿前，召开了九兵团团以上干部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兵团首长有：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副参谋长王彬等同志，另有军的负责同志。会议由宋时轮同志主持，朱总司令在会上作了抗美援朝的动员报告。

朱总司令在报告中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派出第七舰队霸

日伪曲阜罪行一斑

海 源

一九三七年古历腊月初四，天刚破晓，北门外一声炮响，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随即入城，大肆烧杀掠夺，仅北门大街被拆烧毁的房屋就三百多间，卖鸡蛋的颜振江被杀死。这时，大地主、大资本家吴廷玉、蒋笃生、王冠三等，打着“卍”旗子到北门外去欢迎。接着以吴廷玉、顾松桥等为首在书院小学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吴为该会会长。第二天，日本大部队入城，在三省街（今驴鞭把街）尤树岑家设立了一个“宣抚班”，以汉奸王潜为县长组成了伪县政府和警察所。

日军继续到处烧杀奸淫。北门外坊上村一位五十余岁的妇女，被日寇追逐奸淫后用刺刀穿死，保护这一妇女的农民孔宪斌亦被杀死。青年妇女多逃至乡下或避入孔府。为了不使日寇到老百姓家去劫掠，城里各街都成立了小维持会，着人日日轮流把守，一遇情况就集合群众与之应酬。但日寇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仍然明目张胆地抢掠奸淫。他们以查户口为名，挨门逐户地搜巡，不是捉鸡就是要蛋，一遇青年妇女就追着喊“花姑娘”，叫群众称他们“皇军”、“太君”，路过他们的岗哨要脱帽行九十度的鞠躬大礼，否则就给以耳光，甚至用枪托乱砸，用刺刀乱刺。南马道史继文因“行礼不恭”挨了耳光，日军再叫行礼仍嫌不恭，史气愤而走，被抓回用刺刀刺死。

尤其甚者，县维持会当局，为了逢迎和“慰问”日寇，在西门里当铺设立了一个妓女院，逼迫青年妇女数十人，任日寇蹂躏。后来又在县学和南门里设了这种妓院。

人们难忍日军暴行，纷纷起来反抗。张曲村有个农民趁日寇进屋抢东西之际，拿走了放在屋外的步枪；宋家林的群众将一个追寻妇女的日寇砸死投入井中。日军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放火烧村庄，并杀死、烧死王贵友等人。这时，很多人纷纷在农村组织了游击队，但是这些游击队的领导权大都被一些坏人所把持。如：尹庆木起于城西孔家村小安一带；刘金贵、高登科、赵成法等起于城西南各村；巩振环起于鳧村；李太珍起于下宋；刘延仁起于南辛；韩秀常、石玉山等起于土门；朱康桓起于柘沟等。在田黄起事的秦启荣部打着国民党正统旗号聚拢群众，为最大的一股。

秦启荣为了显示力量，一九三八年秋某夜九时入城，袭击南堂庙伪警察所和三省街“宣抚班”，但均无所得，不过三个小时即退出城，遗弃尸体二具，掠走地主颜华南，敲得一笔赎金。

日军城防司令田岛率领三十多名日寇，分乘三辆军车去邹县孟林，路经李太珍部防区小雪，遭李部伏击，汽车炸毁，田岛和中岛翻译虽都受伤，但日军却全部逃回。是役仅掳去尤树岑的小孩（该孩是与田岛同车出城的）。这就是“小雪炸车案”。

这些游击队名为抗日，实际上各霸一方，淫掠百姓，吃喝玩乐。日军看透了他们的实质，于是进行分化利诱。首先挑选了尹庆木，通过吴廷玉的说合，他进城当了警备大队长。其他各股，有的不打自散，有的也陆续投降了日军。如巩振环投降了邹县日军，王绍武投降了宁阳日军，高登科投降兖州日军。

尹庆木当上警备大队长后，跨洋刀，穿日本军服，耀武扬威。整个警备大队，特别是他的护兵“八大金刚”，掳掠、敲诈、奸淫、无恶不作。其下属韩秀常部，经常潜入我根据地边沿地区，抢掠财物，杀害我干部。

伪警察所长王冠平的罪恶不在尹庆木之下。他是日本宪兵队特务，勾通日本宪兵，秘密派遣特务潜入各层组织，统治压迫群众。其最为下流无耻的是，在发良民证时，借印手印之机调戏污辱青年妇女。因此，不少妇女宁愿不要良民证。

日寇对曲阜人民除了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外，还极力搞奴化教育。曲阜城里设了小学两处，师范和农业专科学校各一处。他们对青年学生的统治极为严酷，偶有“小错”即体罚。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们找种种借口随意杀害无辜师生。一九四〇年六月七日夜，大批军警特务突然包围师范学校，逮捕了教员孔肃冰、张云闲、王质夫，学生李嗣连等三十多人。带到警察所内使用种种酷刑拷打逼供，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洋狗撕咬，实在惨不忍睹。当时校长刘秉周正在日本，其回青岛时也被捕。据传，这批师生是被特务们安上“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颯鲁宣传队”的罪名被捕的。后来，孔肃冰被狼狗咬死，王质夫被活埋，刘秉周下落不明，有些学生也被杀害。

日寇为掠夺中国的财富，撕下了尊孔的面纱。曲阜城东八宝山有一煤矿，明朝时曾开采过，后怕破坏“圣脉”而停止，但日寇并不放过。一九四〇年先以博东公司派人勘察，继而实行开采。遭到孔氏族人极力反对后，大耍两面派伎俩，一面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明令禁止，一面却派日人永野顾问在孔府“忠恕堂”召集孔氏族人进行威胁，坚持开采。

曲阜南门外有一片水田，出产有名的香稻。日本人妄想掠夺这一特产，于是在一九四二年把原有的田埂全部毁掉，另辟畦田。经过二年之久，不但侵占了三百多亩良田，还役使很多农民在泥水里做工，遭受鞭挞之苦。

日寇的侵略无孔不入。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他们在周公庙盗挖古物，灵光殿的遗址遭到很大的破坏。

以上所述，仅是我个人所目睹耳闻，也足见日伪罪行罄竹难书。

注：作者曹海源时在衍圣公府六厅中任职员。

上接第五页

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阻挠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大业，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他又指出，美帝国主义进攻朝鲜只不过是当作跳板，目的在于侵略中国。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因此，我们保卫祖国，就必须支援朝鲜人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朱总司令要求志愿军指战员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尊重朝鲜劳动党，遵守朝鲜人民政府的法纪，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英勇杀敌，为中朝人民立功。朱总司令的报告，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家决心为夺取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随后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一道，并肩战斗，痛击美李（承晚）侵略军。

宋 家 林 惨 案

姚村编志组

日本侵略军侵入我国以后，于一九三七年阴历腊月初六日占据姚村车站。此后，日军经常到姚村、宋家林等地骚扰。用步枪打鸡打鸭，入农家赶猪牵牛，搜鸡蛋，追赶妇女。

一九三八年阴历正月二十二日，日军又外出衅事。他们来到宋家林村继续为非作歹。中午十一点多钟，大部分缩回老巢，只有一个叫“迷糊”（日语）的还单独乱逛，寻觅妇女。他从后街到了前街，翻过宋昭雨家车屋院的西墙溜到东院。宋家妇女被惊动后全藏起来，只有几个男人和他周旋。问他干什么，他叽哩呱啦都听不懂，要他写，他也不写，反而打了宋昭雨两耳光子。宋昭雨的大儿子宋明哲气愤不过，猛然把他拦腰抱住，其余的人立即会意，上前搬腿，把他摔倒，下了他的枪。宋明哲马上卸下辘轳杆，照他的头就是一下子，结束了他的性命。当时，聚集了二、三十个人。为了不叫日军知道，大家共同想了个办法，把“迷糊”擀到水井里，投进石头，井桶里塞满了谷草，上面又盖上木板，堆上粪土。

傍晚，日军在宋家林村一带寻找，一边胡喊“迷糊”的名字，一边抓人，叫被抓的人领着找“迷糊”。被抓的人都假装不知道，当天没找着。

第二天，即阴历正月二十三日，他们又到宋家林村北的崔庄搜查，把崔庄的二十多人围聚到场里，挨个询问“迷糊”的下落。虽然大家都听说“迷糊”是怎么死的，但都说不知道。于是，日军就用木棍照人的头部狠砸，用刺刀穿人的腿，大家还是说不知道。日军恼羞成怒，下了毒手，杀死了“小寿”、“材坏”两位青年。临走时还抓走了曹宪稳，放火烧了曹之水、曹之露的九间屋。

日军来到宋家林村后街，又围住了几个人，问一个外号叫“大金瓜”的老年人知道这事吗，这位老人说：“不知道”。鬼子又哇喇哇喇地说：“不知道我枪毙你。”“枪毙我也不知道。”大金瓜当即被日军打死了。又问大金瓜的弟弟二金瓜，二金瓜也说不知道，又被他们砍死了。日军没办法，就把崔庄和宋家林的十多个人抓到车站驻地，用绳子绑起来，用铁条串联上。

事隔一夜，即阴历正月二十四日，日军知道了真相，天不明就包围了宋家林。他们来到宋昭雨家，宋家的人绝大部分跑了，只剩下宋昭雨的二婶子和一个八十多岁的长工王贵友。日军威逼他们说出井在哪里。老长工不说，照长工的腮帮子就是一刀，把嘴划开了；老太太不说，就用刺刀穿。穿了几刀，老太太无可奈何，就说出了那口井。于是，日军逼着被抓去的几个老乡扒井捞尸，随后又放火烧宋家的房子，老太太和老长工都被架到火里烧死。

二十五日，日军又抬来煤油，泼在宋家的屋里屋外和柴堆上，然后放起火来。立时，烈焰腾腾，浓烟滚滚，整个宋家林成了火海。宋家四十多间房子被烧光，临近的二十多间房屋也被烧毁。这就是震惊县内外的“宋家林惨案。”

历代祭孔述略

骆
承
烈

祭孔亦称祀孔，（注）祭祀古称祭礼。古人尊天敬祖，故对上天及祖先的祭祀十分看重，以致有的人说：“祀，国之大事也。”孔子死后，鲁哀公将其生前“所居之堂”辟作“寿堂”，令其子孙“岁时奉祀”，以示对其尊崇与怀念之意。由于在封建社会中，由孔子思想演变而来的儒家思想是统治思想，因此，在历代统治者祭天、祭地、祭日月、祭鬼神的同时，便有一项最隆重的祀典——祭孔。

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在其奔波的一生中，他的政治主张多未为当时各国执政者所用。所以，孔子死时地位不高，当时除了他的门弟子外，只有被其全力维护的鲁哀公哀痛地作了诔文。宣称“旻天不弔，不慙遗一

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粦粦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勿自律”。意思是说：“老天爷真对不起我，连这样一个老人都不给我留下。剩下我一个人在鲁国为君，无人辅佐，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心里十分难过。哎呀，尼父啊！怎能叫我控制住自己啊！”由于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孔子仅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影响远不如后世之大。战国时期又是个“争气力”的时代，各地群雄均要以马上得天下，儒家无权无力，因此孔子死后，对其祀典自然十分简单。当时其弟子及鲁人只能

“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史记·孔子世家》）。及至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统一天下，采纳谋士之言，寻求治国之道时，才找到孔子的学说。为对其更好地利用，遂在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过鲁时，用太牢祀孔子，即用最高的祭天大礼祭祀孔子，并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自此以后，“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东狩至鲁祭孔子，将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一并祭祀。后来孔子的地位扶摇直上，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被封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被封为“玄圣文宣王”，此后不久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秋，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又被封为“至圣先师”。随着孔子地位的不断提高，祭孔仪式也越来越隆重、复杂。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祀孔时，更作“六代之乐”，规定了祭孔时的乐章，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公元550年）皇帝遣使致祭时，又具体规定了“三献”之礼，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规定祭孔乐用宫悬，舞用六佾，明孝宗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又将六佾改为八佾。

历代祀孔既被当作国之大典，于是便不断增多祭孔的次数。最初每年只有秋季一次，后增为春、秋二次。东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诏孔子嫡裔奉圣亭侯孔焜四时祀孔子。自此一年又有春、夏、秋、冬四上丁（即阴历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上旬第一个逢丁的日子）、四仲丁（即上列四个月中旬的丁日）、八小祭（每年的清明节、端午节、六月初一、仲秋节、重阳节、十月初一、腊八、除夕）

及忌日等。后来有时又加上每月的朔（初一）、望（十五），甚至二十四节气等。祭祀有国祭、家祭两种。不同的祭祀不能相互代替。有时一天里遇到几个祭日，便要祭几次。当然，这些祭典有大有小，主要还是春、秋二次上丁，二次中又以秋祭为主。后来人们又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的生日）大祭。自实行公历以来，国民政府又定为阳历九月二十八日。两千多年来（直到解放前），这一天的祭孔不仅仪式隆重，而且连在塾中念书或在学堂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一至三天，以示敬重。

大成殿内受祭者原先只有至圣孔子一人，后来逐渐增加上“四配”、“十二哲”。“四配”即：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子思、亚圣孟轲。“十二哲”即：闵子骞、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和南宋时的大儒朱熹。东、西两庑则位列孔子的其他弟子及日后对传播儒家思想做出贡献的“先贤”（林放、原宪、澹台灭明等）、“先儒”（公羊高、谷梁赤、伏胜等）。这些被供奉者，至民国年间已达一百五十六人之多。大成殿后的寝殿内，还供奉着孔子的妻子亓官氏。另外，在孔庙后部东、西两路还有一些承受祭祀的人。西路启圣王殿及启圣王寝殿内供奉孔子之父叔梁纥、母颜征在。东路后部家庙及崇圣祠内奉祀历代“圣”、“贤”的先人。如孔子以上五代祖：肇圣王木金父、裕圣王祈父、诒圣王孔防叔、昌圣王伯夏，还有启圣王叔梁纥、“圣兄”孟皮以及颜回之父颜无繇（季路）、曾参之父曾点（曾皙）、孟轲之父孟孙激，以及朱熹之父朱松，程颢、程颐之父程珦，周敦颐之父周辅成，蔡沈之父蔡元定，张载之父张迪等。

参加祭孔的人员，原来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自孔腾这个专司对

祖先祭祀的“奉祀君”开始，至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被任命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止，都明确标出祭孔为其主要职责。后来祭孔当作国家的大典，这种“国祭”更加隆重，“家祭”也照常举行。国祭多由皇帝专门指定的大臣、地方官或皇帝亲至阙里孔庙致祭。祭时又分亚献、分献、监祭、典仪等，有时官员一百零三名，鸣赞相礼等礼生八十名（后增为一百名），操琴、吹笙、击鼓、擎旗、舞蹈等乐舞生一百二十名，再加上孔府所属各级官员、四氏学生员、孔氏族人，有时还有庙、佃户人参加。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政府还命令各级学校的学生也参加，往往多达千人有奇。据当事人回忆，除主祭人（一般是衍圣公或孔庭族长）祭孔外，孔府四十名官员中，三品林庙举事祭“至圣先师夫人元官氏”，四品官祭“四配”，五品以下祭“十二哲”、两庑及崇圣祠内各位。大祭这天晚上，从戌时（晚八、九点）到子时（夜十二点左右）才可结束。

关于礼生、乐舞生，孔府档案中记载很多。据《续编曲阜县志》归纳：明太祖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奉旨于曲阜及各州县遴选“民间俊秀子弟”六十名。应赞礼生与乐舞生，一例优免国家差徭。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又添礼生四十名，为陈设用，亦照例优免国家差徭。专为孔庙祭祀所用的乐舞生，也是遴选“民间俊秀子弟”一百二十名，将二十名起送京师太常寺协律处演习乐舞，与生员一例优免差徭。成化年间，添乐舞生八十名，弘治年间又添二十六名，仍照例优免差徭。每逢科岁院考时，选其文学优者近四十名，以作补充。上述规定一直沿袭到清代，乃至民国。

至于具体的祭孔办法，最初比较简单，日后越来越复杂、越繁琐，财物浪费不可计数。案上的俎、豆、筐、爵、簋、簠、筩、铏、

牺尊、象尊、山尊、壶尊中盛满了稻、粱、鳊鱼、鱼醢、鹿醢、兔脯、鹿脯、醢醢、韭沮、笋沮、芹沮、菁沮、黑饼、白饼，还摆上刚宰过的整猪、整羊、整牛（腹中挖空，带头带足），以及铜铎、铜罍（内盛黄酒）、御窑特制的五彩堆料大香炉、烛台等。孔府档案中记，一次祭祀要牛二头、猪二十六只、羊三十一只、鹿五只。各种祭品的质量、形制及来源均有严格规定。如祭牛，必须全黑、体壮，无一根杂毛。专司贡献祭牛的祭牛户，往往四处寻访经年方可得到。鳊鱼、菱、芡必须由昭阳湖中的船户，按照固定的要求（重量、颜色、形状）及时送到，为赶凑祭品，庙佃户人不知要付出多少劳动。

按照惯例，参加祭祀者只应是男子。祭孔以前，主祭人及一些陪祭人员要提前三日去孔庙东、西斋宿斋戒沐浴更衣，做好各种准备。如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大祭三天前，便被人用八抬大轿由孔庙正门抬进东斋宿内，做祭孔的各种准备。参加祭祀者所穿的服装，均依古礼，不得擅自更改。如衍圣公穿的祭服，绛紫色，绣团花，喇叭形宽大的袖口，下身穿类似裙子的“裳”。礼生、乐舞生更有一套特制的服装，标准的“大成乐”及舞具。奏乐及舞蹈均按固定的程式。一切礼乐用品平时存于孔庙后部东、西各九间的礼器库和乐器库。为保证祭孔乐舞的古意及不使此古代乐舞湮没，清至民国年间，曲阜特设“古乐传习所”。

祭孔乐舞的表演场所在大成殿前的露台上。“大成乐”主要有祝（木制，斗状，敲祝开始）、敌（木制，虎形，刷敌结束）、特钟、特磬、编钟、编磬、琴、瑟、箫、排箫、笙、笛、簫、搏拊、塤、鼗鼓等。舞生有的持节，大部分人两手分持龠和羽。舞时分初献（乐奏宣平之章）、亚献（乐奏秩平之章）、终献（乐奏叙平之章）。每部

分又有三十二节，即三十二种动作。每种动作以一个字作代表，如初献第一节“觉”为“正立龠下垂羽植”，亚献第一节“至”为“正立龠平衡羽植居右”，终献第三十二节“嘉”为“俯首至羽龠如十字”等。这一套祭孔乐舞直到解放前后仍有人会演奏和表演。

祭孔时的具体办法，从来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清乾隆时规定：

“前期三日，书写官恭陈各祝版于视事厅正中正殿。祝文曰：

‘维××年×月×日×××代孙袭封衍圣公××等敢昭告于至圣先师曰：惟祖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年。兹惟仲（春、夏、秋、冬）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配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三世祖、亚圣孟子，尚飨’（崇圣祠、启圣祠亦写类似祝文）。衍圣公具公服北向恭阅讫，书写官捧安亭内，同香帛由快靛门送入庙，恭安奎文阁下，遂分述执事榜於庙庭。大成殿正位、配位前衍圣公主鬯，寝殿分献官一员，十二哲分献官二员，东、西庑分献官六员……掌宰以百户，司膳以管勾，典仪以典籍，典乐以司乐，司缙、巡绰皆以伴官，其余分献及各执事，皆以庙庭执事官及教职等……”祭时行跪拜礼多次，各种规定程序十分严格（乾隆版《曲阜县志》卷四十六）。

在一部《大成殿释典礼》的书中，曾这样记载着祭孔的主要仪程：

鸣赞（唱礼的司仪）：乐舞生就位，执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分献官就位。

引赞（在主祭身旁，引导主祭进行各种活动的人）：就位。

鸣赞：瘞毛血。

3 引赞：诣盥洗所盥手，诣酌奠位酹酒尊，一叩三。